

从西安城隍庙广场东侧一条小巷子往里走，七拐八绕，穿过连片居民楼，走到一间一楼的小屋门口。推门而入，16 平方米的屋子有些昏暗。靠墙三层架子上摆着各式帽盔，红、蓝、粉的绒球在暗处泛光；地上散落着刻刀、牛皮纸、铁丝卷。中间一方矮桌，摊着刻好花纹的纸片和尚未烫出弧度的帽壳。

63 岁的韩小利坐在桌前，正细端详一块牛皮纸。他是秦腔戏剧盔帽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，圈内人称他“关中帽子韩”。

屋内灯光很难分辨纹样和贴箔的细微缝隙。每做完一块部件，他都要走到楼道口，借着阳光反复检视。“老话说夜不观色，灯光底下和太阳光底下看东西，不一样。”

这是他恪守多年的规矩。

这间 16 平方米的小屋，面积不大，却装下了他的大半辈子，也装下了他的盔帽世界。

从“坐不住”到“坐下来”

韩小利的父亲韩炳杰，16 岁从临潼到西安学艺，拜入白福兴先生门下。“那时候当学徒苦，学不好，师傅是要打的。”韩小利向我们讲述父亲当年的往事。

学成之后，父亲在城隍庙经营永兴剧装店，铺面不大，只有十几平方米，就在大殿侧边的厢房里。“白天把案子支开裁料做活，到了夜里，干活的案板直接就当床睡，吃住做工都挤在那一间小屋。”

永兴剧装店店面虽小，活计门类齐全。当时西北戏曲行头，大半出自西安城隍庙匠人之手。“那时候西安做戏装的手艺人齐全得很，做戏服、做靴子、打造刀枪靶子、扎须子、挽纽门，各行当都有专门的匠人。”韩小利感慨，“就连山西、河南靠近陕西一带的剧团，都会专门跑到西安，置办全套的舞台行头。”

韩小利在家排行老三。大哥、二哥先后跟着父亲学习盔帽制作，“我那会儿还小，坐不住，爱逛，连看都不看”。父亲却逼着他也要学。“不学不行，”韩小利回忆，“他说这东西能挣钱，能养活人，农村现在这么困难，你不学干啥？”

韩小利拗不过，在父亲的“威逼”下，开始收心学习制作盔帽。“那时候，大人叫你弄啥你就得弄啥，既然拗不过，那就开始学呗。”放学后、假期里，他坐到桌前跟着父亲学。父亲教大哥二哥很细，对他反倒管得少，“我算有点天赋，上手很快，父亲看在眼里，知道我能做好”。

真正让韩小利踏实坐到桌前，不是父亲的严格要求，而是画画。当年，父亲在渭南剧团做工时，刚好遇到一位师兄，以前在西安光武制景公司任经理，画布景功底深厚。

“父亲知道我喜欢画画，趁这个机会，便请求师兄教教我。”就这样，韩小利跟着师伯和另一位老师学画布景，两位老师用心教，他认真地学，这段经历给他打下了深厚的美术底子，也让他真正“坐下来”。

如今，做帽盔的匠人，绝大部分只能照着现成的样子复刻，韩小利却能够根据尺寸、姿态、舞台比例等信息做出新花样。“全国能做到这个水平的匠人不过四五位，其他人都是看人家哪个样板好，拿回来照着刻。特殊的活，你就做不了。”韩小利笑着拿着手里刻好的“样子”说。

一顶盔帽十道工序

“一项手工盔帽，大工序有十道，细分下来小工序有几十道。”韩小利坐在桌前，一样一样数：制样画稿、刻活、加纱、掐铁丝、烫壳、立粉、刷胶、贴金箔银箔、裁剪缎料、组装成活。

“这里面刻活和烫壳最难。”韩小利指着桌子上刻好的纸片说，“刻活决定纹样的最终呈现。你活刻不好，帽子就做不好。”刻的时候要看看纹样的走势，该断的地方断，该连的地方连，一刀走偏，后面再多工序都

补救不回来。他摆弄着桌上还没烫出弧度的帽壳说：“烫壳，就是把这帽子烫成想要的形状。它本来是个纸片，你得把它烫成样，最后再把两片一合。”这一步主要是依靠温度与手法，塑造成盔帽复杂的立体弧度，韩小利一边示范一边讲解。

最能体现一顶盔帽灵魂的还是第一步“出样子”。“出样子就是制样画稿。”盔帽上的龙凤、祥云、草花、蝙蝠，耳子、牙子、摠子的位置和比例，全在这一步定下。没有好的“样子”，后面刻活、烫壳、贴金都无从谈起。

这些功夫一半靠当年学画布景打下的底子，一半靠几十年泡在戏里练出来的眼力。

韩小利拿起一顶银色盔帽，“这是太监戴的。”又指着一顶金色王帽，“这是皇上的。”再指另一顶，“这是大将的。”

“不懂历史文化，光知道做，神韵是出不来的。”他说，做盔帽不能只懂技法，还要懂戏曲、懂历史、懂人物。凤冠为什么缀满蝴蝶与凤头？因为那是花旦与正旦的标配。夫子盔为什么属于关公？帅盔为什么属于元帅？“一顶盔帽往头上一戴，人物的身份、官职、性格甚至命运，观众一眼便知。”韩小利说，“有的团帽子不够，那就胡戴哩，一个帽子戴到底，行家一看，笑话你。”

“外行活”打开新局面

戏台上的锣鼓还在响，韩小利手里的活儿也没停。只是，戏台底下的光景，正悄悄改变。

20 世纪 90 年代起，戏曲市场渐渐冷了下来。到 2000 年以后，陕西的县级剧团大批解散，从前 100 多家剧团遍地开花的光景不再，当时能正常排演的院团剩下不到 30 家。

市场的持续萎缩导致戏帽的订单断崖式减少，面对如此困境，韩小利却没犯难。他这辈子总抱着个念想，手上有手艺，就不怕没饭吃。

非典前后那几年，城里饭店时兴模特走秀，有人辗转找到他，要做时装表演时模特戴的帽子。起初他不愿接，觉得是“外行活”，耐不住熟人再三上门，试着做了一批，反倒打开了新局面。

“戏曲帽一顶得做十来天，这时装帽快，一两天就能出六七个。”时装帽讲究样式新、出货快。酒店模特队今天要一顶夸张的羽毛帽，明天要一顶镶亮片的头饰，样式换来换去。他有戏曲盔帽的底子，造型、构图、配饰都在行，别人做出来的歪歪扭扭，他做得服帖周正。“他们做那个不太合适，外形不太好。咱本来就是做帽子的，懂他们想要什么效果。”韩小利说。

这股风过去后，他

只要戏曲还在，这手艺就绝不了

又接上了给神像做帽子的生意。甘肃一带有一种乡俗，老百姓常买顶戏帽送到庙里，给神像“戴”，“普通的几十块钱一顶，一年能做几百顶。定制的就贵了，得重新出样子，一顶能卖一千多。”这类生意又持续了七八年。

“反正我一辈子其他啥也没干过，就靠这门手艺养家。”老戏开演时做戏帽，戏曲没市场了做时装帽、敬神帽，做的物件变了，但是手上的功夫始终没变。他没转过行，也没想过转行，“东方不亮西方亮。”他笑着说，总有法子让日子过下去。

在韩小利看来，手艺能立住，就不怕市场变。从戏台到 T 台，从庙堂到酒



韩小利，秦腔戏剧盔帽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人称“关中帽子韩”。他出身制帽世家，15 岁随父学艺。1994 年曾为《大话西游》打造紫霞仙子凤冠、至尊宝秀才帽等道具。

店，他手里的盔帽换了模样，却始终没离开“头顶”这一方天地。那些针脚、那些造型、那些对“人戴这个头围”的懂得，是岁月磨出来的本事，也是非遗传承最朴素的道理——只要手上功夫在，日子总能过下去，手艺总能传下去。

其实，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，他的手艺就出过圈。1994 年，《大话西游》剧组经人推荐找到他，要做一批影视头冠和道具。他收拾了工具就去了银川，在剧组一待就是 6 个月。

一开始给紫霞仙子做凤冠，他按戏曲凤冠的路子出了样，港方的美工说太“戏剧化”，要改。按照对方的想法调整架子，加了流苏，“改完的效果还真不错”。当时剧组很难找到能做出硬质立体盔甲的师傅，别的材料做出来软软塌塌，撑不起气势，他想到黄纸板，糊了四层，又烫出硬挺的弧度，这样做出来的盔甲穿在身上，棱棱角角都立着，正好就是导演想要的那股威严劲儿。

到后来，道具组缺人，他也去帮忙，做过不少道具，还做过至尊宝的面具。“你看这是从周星驰脸上拓下来的，连双眼皮皮的纹路都清清楚楚。”韩小利翻找出一直珍藏着的周星驰的脸模，爱不释手。

剧组工作结束后，他回到这 16 平方米的盔帽世界，继续守着这个作坊认认真真做活。

收徒从来不只是教手艺

16 平方米的工作间里，一个老人，一张矮桌，几把刻刀，堆叠的黄板纸与铁丝……一顶顶华美的盔帽从这里走向戏台、走向银幕。

但韩小利心里清楚，比做帽子更难的是，是找人来接过这顶帽子。

面对采访，韩小利苦笑连连：“年轻人都不愿意学，就是愿意学，我也不敢收。”

不是他捂着这门手艺不肯教，从十几岁跟着父亲学艺，做了 40 多年的帽子，韩小利太清楚学这门手艺的辛酸。

目前，机器做的盔帽占了大半市场，流水线做出来的纹样比手工还规整，成本却低了一大截。小剧团图便宜，三四百块钱就能买一顶机器帽，手

工盔帽动辄上千，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。

他认一个死理：机器做的帽子再工整，却没有“活气”。手工刻的纹样，不那么细致，却更灵动，贴的金箔银箔，在自然光底下泛着润光，不是印刷色能比的。“行家看戏，帽子一戴，对不对味，一眼就知道。”

“现在一般人纯做戏帽，可能生计都成问题，更别说发展。”韩小利坦言，“有时候碰到想学的，但是转念一想，算了，不能害了人家娃。”

他不想让这门手艺断在自己手里，先后带过 5 个徒弟。因为要传承家族手艺，他先把技艺教给了侄子韩永辉，侄子学了七八年，最后转了行。还有一个原本是剧团演员，因为嗓子坏了唱不了戏，为了能留在剧团，跟着他学做盔帽。

这些年，韩小利对收徒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。早些年他是“真心不敢收”，怕耽误年轻人。但手艺要传，总得迈出这一步。他开始琢磨，能不能找到一条让手艺“养活人”的路子。

电视剧《主角》热播，秦腔盔帽意外“出圈”，韩小利发现，盔帽不再只是戏台上的“行头”，也可以走进普通人的生活。他开始参加进校园、进社区等活动，把几顶盔帽往桌上一摆，就有年轻人围过来问东问西。

对韩小利来说，收徒从来不只是教手艺。手艺可以慢慢练，但对秦腔的理解、对角色神韵的把握，需要时间沉淀，更需要一份真心热爱。

让他欣慰的是刘卫东，他毕业于西安美院，现在是西安一所高校的教师，出于对秦腔和非遗的热爱，主动上门拜师。每周课余时间，他从刻样和掐丝一步步学起。

“这个徒弟，是今年才收的。他在网上关注了我好几年，一直都想学。”韩小利说：“人家就喜欢这个，又有稳定的工作，生活不愁。他是真喜欢这东西。”

从“不敢收”到“等年轻人来”，韩小利的心态在变，但有些东西没变。

他依然每天伏在那张矮桌前，刻纸、掐丝、沥粉、贴金。一顶凤冠要十几天，工序一道也省不得。“盔帽终究是慢工出细活，急不来。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韩小利起身，从架子最里头取下一顶帽子，轻轻放在矮桌上。

“这是我父亲做的。”

那是一顶旧式凤冠。蓝缎子褪了色，点翠磨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胎。他翻过帽子，指着内侧一层发黄的麻纸：“你看这壳，过去用麻纸打的，一层一层糊。几十年了，还结实。”

他说，这帽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做的，到现在七八十年了。“你现在要拿去戴，还能戴十来年。”他看着盔帽感叹：“过去人把这土东西做得多扎实。”

灯光下看不清那顶旧帽子的细节。他像往常一样走到楼道口，把帽子举过头顶。阳光下的这顶帽子，依然熠熠生辉。

回到屋里，他把旧凤冠放回架子最里头，又坐回桌前。桌上还摊着未刻完的纹样，刻刀搁在一边。他拿起刻刀，低头对着牛皮纸比画着。

“你怕不怕这门手艺失传？”

“只要戏曲还在，这手艺就绝不了。”这句话，韩小利说得铿锵有力。

从坐不住的少年，到如今的“关中帽子韩”，他就在这一方世界里，用一把把刻刀、一片片纸壳，把戏曲里的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，都定格在了戏曲演员头上这顶盔帽上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

见习记者 殷艺嘉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